

*MEMORIAS
DE ESPAÑA*

1937

1937年西班牙回忆

(墨) 埃莱娜·加罗 著
ELENA GARRO
吕文娜 译

漓江出版社

*MEMORIAS
DE ESPAÑA 1937*

1937 年西班牙回忆

(墨) 埃莱娜·加罗 著
ELENA GARRO
吕文娜 译

漓江出版社

桂图登字：20-2014-1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37年西班牙回忆 / (墨) 埃莱娜·加罗著；吕文娜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407-7201-7

I . ①1… II . ①埃…②吕… III . ① 回忆录—墨西哥—现代
IV . ① I73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177268号

翻译自 ELENA GARRO, MEMORIAS DE ESPAÑA 1937, first print
Copyright © ELENA GARRO 201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 © 2014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1937年西班牙回忆

(墨) 埃莱娜·加罗 著
吕文娜 译

责任编辑：胡子博

责任监制：唐慧群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后地村村北工业区 邮政编码：101109)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4.75 字数：105千字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10—80557366)

1

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卡尔·马克思。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的文哲系，我们只学习过希腊人、罗马人、法国人、德国浪漫主义者、西班牙古典主义者、墨西哥人；但马克思，没有。拉丁语是必修的，这是古希腊的根；那时的教育跟现在的很不一样。

那时的墨西哥城是一座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城里满是公园、树木、巴洛克式教堂、殖民地时期的宫殿以及现代化的楼房。城市被来自阿胡斯科山区的风吹拂着，从我们的阳台都能看见山里的小树。天很高，很蓝，晚霞很美，蔚为壮观。整个墨西哥分布着两千万居民。两千万安静的人们，正如“当代人”派的卓越诗人萨尔瓦多·诺沃^①所说，“两千万人民是不能犯错的”。

“当代人”这个团体于血腥的反取缔教会革命后在墨西哥重建了文化。“当代人”们不是政治家，只是些博学多识的人。他们介绍给我们T.S.艾略特、安德烈·纪德、乔伊斯、马尔拉乌斯、马拉美……哈维尔·维亚鲁提亚，小组里的一位诗人，在圣胡安·德·雷特朗街上开了一家叫做“海马”的艺术品商店。下午

^① 萨尔瓦多·诺沃(Salvador Novo, 1904—1974)，墨西哥作家、诗人，“当代人”派作家代表，墨西哥语言学院院士。

的时候,那里就聚集着他的“当代人”朋友们。那家商店很小,玻璃柜里陈列着精挑细选出来的书籍和版画。哈维尔彬彬有礼,个头儿不高,嗓音优美,不声不响地写作他的《夜行人》。他建议我将安德烈·纪德的《珀耳塞福涅》搬上舞台。那时我是由胡里奥·布拉丘领导的大学剧团的舞蹈编导,我们曾在美术宫里演出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那段日子里,赫拉尔多·迭戈^①的《文选》和加西亚·洛尔卡^②的《吉卜赛谣曲》传到了墨西哥,带来了一股狂潮。拉法埃尔·阿尔贝蒂^③和他的爱人玛利亚·特雷莎·莱昂也来了,他们将在阿斯图利亚中心做几场讲座。人们对那对夫妇的优雅及拉法埃尔的书《关于天使》谈论得很热烈。

恩里克·拉米雷斯·拉米雷斯,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肤色略黑,大大的黑眼睛,总是穿鞋不穿袜子。他在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是一位朋友把我带到那儿去的)送给我一本杂志——《建设中的苏联》,封面上有一位金发姑娘在苹果花丛中微笑。恩里克没穿袜子我并不感到惊奇,在墨西哥有这样一句俗语:“这里抢袜子不脱鞋。”让我意外的是青年组织竟然在一座老式的殖民地时期的房子里占了一间大大的屋子,却只有一张黄色的写字台和三把椅子。同一天下午,特雷莎·坡玛尔来到这里并亲吻了恩里克。这位活泼的姑娘人称“小火炉”,据我听说是党内坡玛尔部

^① 赫拉尔多·迭戈(Gerardo Diego, 1896—1987),西班牙“二七年一代”诗人。

^② 加西亚·洛尔卡(García Lorca, 1898—1936),西班牙“二七年一代”诗人、剧作家,于西班牙内战开始时被长枪党杀害。

^③ 拉法埃尔·阿尔贝蒂(Rafael Alberti, 1902—1999),西班牙“二七年一代”诗人,于西班牙内战中流亡海外,曾与妻子玛利亚·特雷莎·莱昂合写诗集《中国在微笑》。

长的女儿。

有一天，一位朋友把我从课堂里拽出来，天色昏暗时将我带到国民宫前，那儿正进行着一场示威活动。人群中有一位短发、长着男孩脸的姑娘，她对我极为亲切，她叫宁法·桑托斯，陪着她的是一位蓝眼睛的先生埃尔米罗·阿布雷乌·戈麦斯，后来他们结了婚。从那天晚上开始，宁法和我之间就建立起一段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友情。

那时候我很年轻，西班牙正爆发一场内战，而在墨西哥，不同党派的分子们在街上互扇耳光。墨西哥人都跑到西班牙大使馆要求参加西班牙军队。“好的，好的，但是参加哪一方啊？”西班牙的官员问道。回答是：“哪边都行，我就是想去杀死那些西班牙混蛋。”至少据说是这么回事。

我在马德里把这事儿讲给拉法埃尔·阿尔贝蒂，他笑了起来：“你这个丫头，长着张小嘴儿就是用来讲怪话的。”我比拉法埃尔·阿尔贝蒂了解情况，是因为我来自西班牙的殖民地。我对他解释说，有一次过呼声节^①，南方某镇请我弟弟和表弟波尼在庆典上做王后和公主的伴童，因为他们俩长得都很漂亮，那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家坐在革命军中的主席台上。我姐姐德娃和我从台上溜下来钻进人群。由于我们还是小孩子，只能看见一个由帽子组成的屋顶。突然，“呼喊”开始了：“墨西哥万岁！”……“万岁！”人群齐喊。“让西班牙鬼子去死吧！”“去死吧！”人群又应道。我姐姐和我逃回家里紧闭的大门前，父母既然不回来，我们就等佣人回来。我父母怒气冲冲地回来了，冲我们吼道：“你们把庆典全毁了！你们跑哪儿去了？军队、王后、整个广场都天翻

^① 指墨西哥国庆节。——译者注

地覆地找你们。你们简直太不像话了。”

之前在墨西哥时，奥克塔维奥·帕斯写过一首诗：《休想通过！》。他因此被邀请去参加马德里的一次反法西斯知识分子代表大会。然而帕斯当时在尤卡坦^①，不晓得这回事儿。必须给他发电报。他回电做出指示：我得去革命作家艺术家联盟，说他接受了邀请并将尽快赶回墨西哥城。在“联盟”我认识了奥尔伽·科斯塔科夫斯基，一位很漂亮的女性，后来我得知她是查维斯·莫拉多的“伴侣”。一切在几分钟之内就搞定了。去西班牙之前，帕斯在玻利瓦尔街上介绍我认识了胡安·德·拉·卡巴达，他身边有当红的大明星安德雷阿·帕尔玛相伴。他们俩邀请我们去吃冰淇淋。胡安准备了一篇小说《橡胶工人》，这小说在法国的火车上丢了。为了跟朋友们聊天，胡安到了朋友的车厢，等他想回自己的车厢时，发现那一节车厢已在某一个车站给卸下去了。他惊恐地回到朋友那里，喊着：“火车变小了，变小了！”这部他花了两年时间待在塔巴斯科热带丛林里完成的小说再也没找回来。

去西班牙的人分成了两个小组。被邀请者小组：卡洛斯·佩伊塞尔^②、奥克塔维奥·帕斯与何塞·曼西斯朵尔^③；自愿者小



帕斯(老年)

^① 尤卡坦半岛，墨西哥东部旅游胜地，有多处印第安人古迹。

^② 卡洛斯·佩伊塞尔(Carlos Pellicer, 1897—1977)，墨西哥现代派诗人。

^③ 何塞·曼西斯朵尔(José Mancisidor, 1894—1956)，墨西哥作家、历史学家、政治家。

组；席尔维斯特雷·雷维尔塔斯^①、胡安·德·拉·卡巴达、费尔南多·加穆博阿、查维斯·莫拉多，还有玛利亚·路易莎·维拉。

几天之后，我们被约到市中心，登上一辆面包车，开始了我们的旅行。我们先前往美国。小组成员如此混杂，以至于在德克萨斯的小镇上，穿着蓝色长裙、戴着浆过的帽子，占据有利地形以兜售小筐李子的老太太们，把我们当成了一个马戏团。

胡安·德·拉·卡巴达分配了角色：加穆博阿饰演经理，苏萨娜·斯蒂尔演他的伴侣，一位健壮妇人；雷维尔塔斯演胖子；查维斯·莫拉多演小丑；奥克塔维奥·帕斯演个帅小伙子；曼西斯朵尔是驯兽师；胡安当吊杆演员；我是马术师。为了不太引人注目，我们选择在偏僻隐蔽的地方吃三明治。“多美的花园啊！”“保护得多好啊！”我们正说着呢，突然冒出一个怒气冲冲的德克萨斯人，冲我们嚷嚷说在墓地里禁止吃东西。

夜里，我们找最脏的旅馆住，以免因为是有色人种而遭到拒绝。我觉得他们夸大了对美国人的恐惧。我们到纽约后，跟阿雷纳尔、威尔德修、奥戈尔曼聚在一起，他们都娶了美国太太。奥克塔维奥、佩伊塞尔、曼西斯朵尔和我得从加拿大乘船，其他人将在纽约找船。我们差点误了去加拿大的火车，而在魁北克时我们又忘了下榻的旅馆的名字，回不去了。当然，这些麻烦事的过错都在我。

去西班牙的旅途是愉快的。我，不知道如何、也不知道为何去参加一次反法西斯知识分子代表大会，尽管我既不“反”任何

^① 席尔维斯特雷·雷维尔塔斯(Silvestre Revueltas, 1899—1940)，墨西哥作曲家、指挥家。



埃莱娜·加罗(最前)、帕斯(后排右四)、阿尔贝蒂(后排左三)、曼西斯朵尔(后排右二)、雷维尔塔斯(后排右三)、费尔南多·加穆博阿(中排右二)、苏萨娜·加穆博阿(中排右一)、查维斯·莫拉多(后排右六)、玛利亚·路易莎·维拉(中排左一)等人合影。

东西,也谈不上是个知识分子,我只是个学生和大学里的舞蹈编导。英国船“不列颠快船号”很不起眼,船长把花送到我的桌上,因为尼古拉斯·纪廉^①和胡安·马里内约散布了一个谣言,说我是一位俄国芭蕾明星,在乔装旅行。胡安·马里内约说:“帕斯的小娘子很有艺术气质。”而我恶作剧地叫他马蒂内罗,因为他总是谈到马蒂。

从瑟堡到巴黎的旅行棒极了。我之前从未见过麦田里点缀着小小的红色虞美人,法国的田野之美使我时常发出惊叹,而这却让帕斯很恼火。

在巴黎的火车站,我听到有人在喊帕斯。我从窗口探出头去说:“在这儿……”一位金发的先生,穿着灰色衣服,样子很优雅,微笑着说:“不,我们找你的父亲。”他是路易·阿拉贡^②,与他同来的有阿莱霍·卡彭铁尔^③,很瘦,很年轻,还有琵塔·罗德里格斯,等等。他们说:“都是些孩子……”

我只想看卢浮宫、圣雅克塔、法院大楼、内斯勒塔,听说内斯勒塔已被摧毁时,我感到万分难过。我已读过了大仲马的东西,知道再也不会碰到一位像他一样的作家了。法国的司机很理解

^① 尼古拉斯·纪廉(Nicolás Guillén,1902—1989),古巴诗人、记者、政治活动家、作家。1937年加入古巴共产党,被誉为古巴民族诗人。

^② 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诗人、作家。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参加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1927年加入法国共产党。

^③ 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1904—1980),古巴小说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新闻记者和音乐理论家。曾将欧洲超现实主义与本地化融为一体,代表作《人间王国》被认为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早期代表作品。

我，他打开出租车的顶篷，高兴地向我介绍那些建筑物，在送我们去赴晚宴之前四处兜兜风，而那些研究马克思而非大仲马的作家们正在等着呢。晚宴设在一座巨大的山洞里，赴宴的人多极了。所有的人都抢着说话，葡萄酒像海水一般流淌，可我注意到没人吃东西，他们为了不停地说话，几乎没碰盘子。

同一天夜里，在演说和晚宴之后，巴勃罗·聂鲁达^①把我们带到一家满是臭虫的小旅店。我们坐在两张椅子上过了一夜，沮丧地迎来黎明。帕斯批评我：“你真是个资产阶级，你得坚强起来。”我读过《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那天晚上我证实它跟加德尔的探戈的相似性……跟加尔西拉索多么不同啊！胡安·拉蒙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卢贡内斯式诗歌和聂鲁达式的……”我喜欢胡安·拉蒙，过了一段时间，当我在他的哈瓦那家中认识他时，他那坐在热带摇椅里的形象让我感到很有出入。几年以后，堂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对我说：“胡安·拉蒙一直是个有怪癖的人。他对人有恐惧感。有一天下午我去他家，请他与《海盗》合作。一个声音从屏风后传来说：‘胡安·拉蒙不在家。’然后，那整扇屏风踮着脚尖穿过客厅，从一扇门里消失了。您觉得怎么样，堂娜埃莱娜？”我，觉得好极了。



聂鲁达(1904—1973)

^① 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1973)，智利诗人，于西班牙内战中坚定地支持西班牙人民，帮助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逃亡到拉丁美洲。1937年创作《西班牙在心中》，1945年加入智利共产党，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2

在巴黎的那天，瘦削的阿莱霍·卡彭铁尔穿了长裤、西服上衣，没穿背心。他将我们带到在特洛卡德罗广场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入口处立着一对男女青年塑像，在高高的底座上迎风前进。这也是苏联展厅的入口，那里摆放着死气沉沉的机械设备，还有一幅由翡翠、钻石、祖母绿、红宝石、珍珠和黄金做成的苏联地图。地图本身是一件令人眼花缭乱的宝贝。阿莱霍对我说：“珠宝是属于人民的。”我应道：“啊，就像教堂里的一样。”大厅里还有格拉西莫夫画的所有苏联元帅的油画头像。“老学究，斯大林趣味。”帕斯低声发表他的议论，可是这些比西班牙展厅里的



《格尔尼卡》(毕加索作)

那幅《格尔尼卡》^①让我喜欢,因为我觉得后者是用碎报纸拼成的。是驻巴黎的西班牙大使堂路易斯·阿拉其斯泰恩出主意向毕加索求了一件作品来参展,当然也付给他钱了。然而堂路易斯已经回国了,接替他的是葛尔东·奥尔达斯。我所知不多,但在西班牙曾有一场政治危机,拉尔格·卡瓦耶罗和阿拉其斯泰恩失了势,而胡安·内格林和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掌了权。尽管我不大在意战争,尽管那些作家们都低声用政治隐语交谈,我也知道西班牙的战争很激烈,就像那些天在苏联的情况一样。

天色转黑的时候,我们坐上了去西班牙的火车。帕斯想把行李留在满是臭虫的旅店,我们连那儿的名字、地址都没记住。他向我发出指示:“咱们不要带衣服了,我们去的是一个正处于苦难中的国家……”于是我只选了两条布裙子,而对这没完没了的命令我已开始厌倦了。

在车厢里我们碰见了安德烈·马尔拉乌斯,金色的头发,惶恐的浅色眼睛;还碰见了安德烈·查姆森,总是乐呵呵的尼古拉斯·纪廉,曼西斯朵尔,马里内约,等等,等等。

我们发现没有水也没有电。“有人搞破坏。”曼西斯朵尔嚷道。拉法埃尔·阿尔贝蒂不怀好意地说:“可怜的曼西斯朵尔。”我们在坐落于马德里的埃雷迪亚·斯皮诺拉公爵府上发现一捆公爵的信,信中提到他的一位佣人时,总是用“可怜的曼西斯朵尔”的叫法……“你瞧,他可著名了!”他当时就在堂皇的公爵府的图书馆里笑起来了。

^① 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创作的一幅名画,表现的是1937年德国空军轰炸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的惨状。

我们像狗一样过了一夜，没觉睡，没水喝，又脏又累。实际上，战争是折磨人的。早上到达西班牙时，知识分子们分头前进了。马尔拉乌斯在他的朋友们的陪伴下，沿着一条小路进山了；我们则乘一辆小火车，穿过一条隧道来到了博港（西法边界处的一个港口）。那里的镇委会人员带我们来到海边：

“请看，同志们，在那儿，一枚有阶级意识的炸弹，它没爆炸。”

他们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躺在海滩上的巨大的铁蛋。作家们激动地议论纷纷，说那炸弹是多么的有阶级意识，边说还边用指责的眼光打量我这个他们眼中的“小资分子”。

我们又向巴塞罗那进发了，沿途所见的撞毁的汽车真是触目惊心。我不禁打听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事故。回答是：“你瞧，同志，因为同志们都不会开车，坐在车上就像疯子一样乱闯，当然就会发生事故了。”我们面对这样的解释，不知该说什么好。下午我们到达了巴塞罗那，那城市给我的可怕印象实在令人难忘。好像有一顶巨大的铅盖子覆盖在上面，灼灼地散发着热气。树木的枝条显得破碎不堪，街道几乎都荒芜了。一股沉重的悲剧气氛给我带来恐惧，我从未见过那样的城市。我们下榻在格拉西亚大街的帝王饭店。我从窗户探出头去，看不见胜利的军队，只有一片悲伤的沉寂。我想马上离开西班牙，我对帕斯说：“我要回家。”他对我的愚蠢感到很愤怒：“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你带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今天也不知道。

这些知识分子们低声谈论着 POUM^①。POUM？我在墨西哥的时候很熟悉他们，是他们安排的让托洛茨基去了墨西哥，我有

^①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缩写。

他们的照片，有法雷尔、巴尔托梅乌·克斯塔、桑其斯、雷乌尔。迭戈·里维拉^①的亲戚陪他们去的车站。我兴奋地说：“他们走的那天我看见了。”“撒谎，你根本不认识POUM的人。”帕斯听我提到他们，马上打断我，禁止我再张嘴。

那些知识分子们装作什么都没听见，继续谈论别的事情。晚上，我们被带到正对着电信大楼的共和国广场。

“就是这儿……是的，可怕极了……”他们看着断然说道，尽管广场空空如也。我则盯着电信大楼，我叔叔郝阿金在那里工作。我早早地跑去看他，进去看到楼里没什么人，我向人打听，一会儿他惶恐不安地出来了，一看是我，大喊道：“你简直跟瓦伦丁一样勇敢。”然后拥抱了我，我问他：“这儿出什么事了？”我叔叔小心翼翼地用两句话解释说：“跟无政府主义者发生了一场枪战，你什么议论也别发。”我什么都没说，又跑回了饭店，别人都等着我一起去瓦伦西亚呢，代表大会将在那里举行。路上又见到很多撞毁的汽车，民兵司机巴戈和安东尼奥重新对我们解释说：“同志们没收了汽车却又不会开。”我们碰见一些穿着丧服的农民举起拳头说：“祝同志们健康！”另一些则双手合十，我和佩伊塞尔更喜欢这种手势。我没留意到一种是共产主义的，而另一种是无政府主义的。早上我叔叔已经对我说过，各种意识形态正处于冲突之中，我没太把它当回事。

将近下午三点时，我们到了瓦伦西亚。天气很热，我们被带到一座海滨别墅，胡安·内格林在那里为知识分子们准备了一顿海鲜烩饭。人很多，我们感到无所适从，我们都不擅交际，秩序又

① 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 1886—1957)，墨西哥著名画家，20世纪最负盛名的壁画家之一，被视为墨西哥国宝级人物。

是一片混乱。一位胖胖的貌似公爵的矮个男人激动地走近我说：“喂，你看见我的烟没有，我把它弄丢了，你帮我在桌子下面找找。”我们俩都四脚着地了。他问：“喂，你是谁呀？”我说：“谁都不是。”“很好。我是阿卡里奥·科塔坡斯，阿卡里奥·科塔坡斯，智利音乐家。”

“帕斯同志，你的同伴在找你！你趴在地上干吗？我是阿尔杜罗·塞拉诺·普拉哈。”一位鼻音很重的穿布裤子的小伙子问。阿卡里奥·科塔坡斯打断了他说：“我的烟丢了。”

塞拉诺·普拉哈把我们带到大会的开幕式上。那里满满的全是人。主席台设在下面中心位置，胡安·内格林在那儿。一名极度苍白的男子进来，拄着拐杖，脸庞俊美，何塞·贝尔加明以他庄严的声音、优雅的手势宣布“古斯塔夫·莱格勒，前线的伤员……”，这名字激起一阵阵的掌声。“看，那儿是苏联代表团，那位就是托尔斯泰！”塞拉诺指着一个金发碧眼、脸色红润的大块头对我说。那人旁边坐着一位忧郁的男子，灰色头发，脸色苍白，穿西装。普拉哈谨慎地说：“另外那个人是伊尔亚·埃伦博格。”帕斯问他：“他们有麻烦了，是吗？”“已经解决了。”佩伊塞尔用他那雷鸣般的声音道：“我跟他们谈过了，我说托洛茨基是个大煽动家。”内格林说了几句话，然后贝尔加明宣布托尔斯泰为第一位演讲者。要理解那谜一般的马克思式的话语是很难的，有人会说那是一种密码语言。我明白托尔斯泰不喜欢托洛茨基，尤其当佩伊塞尔喊道：“这就是了，他们正在攻击大煽动家。”

塞拉诺·普拉哈向我们介绍路得维格·雷恩，这人个子高高的，很瘦，戴眼镜，神情刚毅，周围围着另外一些人，里面有安娜·塞格尔丝，一副善良女教师的样子。我后来在墨西哥又见到了他们两个。安娜被车撞了，情况很糟糕。古斯塔夫·莱格勒我也见

过,他有一天晚上去了巴勃罗·聂鲁达的寓所,苍白而愤怒。后来他搬到奎尔纳瓦卡,七十年代早期在一次旅行中死在了印度。我知道那时有不快,有困难:永远的革命这句话把共产主义者分成了几个阵营。那时候莫斯科刚进行完第二次清洗,老派的共产主义卫士迅速消失了。我一直没什么政治头脑,没在意那幕戏剧,直到 1938 年 3 月,第三次清洗当中,有一天早饭时间,我看见帕斯流着泪喊道:“布哈林……! 不! 布哈林,不!”我问他:“他是谁?”“你怎么问得出这样的问题? 他是党的思想家,《共产主义 ABC》的作者……”我在报上读到他在背后挨了一枪,我无话可说。谁能明白那些事情呢? 做一名共产党员是戏剧性的,也是……危险的。